

数智时代青年数字实践的价值冲突研究

吕梦静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17日

摘要

青年作为数智技术的原住民, 其生产生活方式正被数字化劳动、虚拟化社交、平台化消费、智能化学习所重构。然而, 技术赋能的背后潜藏着深层次价值冲突: 算法规训导致数字劳动异化、虚拟社交的符号化特征弱化青年的情感联结、平台化消费的功利化导向加剧自我的商品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过度使用削弱青年独立思考与创新能力。究其根源, 既有青年数智素养的不足、规则制度滞后和教育引导不足的内外诱因, 又有技术异化和工具理性僭越的深层制约, 使得青年在价值认知、行为选择中陷入多重冲突。

关键词

数智时代, 青年, 数字实践, 价值冲突, 全面发展

Research on the Value Conflicts of Young People's Digital Practices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Mengjing Lv

College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May 12, 2026; accepted: June 4, 2026; published: June 17, 2026

Abstract

As native inhabitants of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young people are witnessing their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daily life being reshaped by digital labor, virtual socialization, platform-based consumption, and intelligent learning. However, beneath this technology-driven empowerment lie profound value conflicts: algorithmic discipline leads to the alienation of digital labor; the symbolic nature of virtual interactions weakens emotional bonds among the youth; the utilitarian orientation of platform-based consumption intensifies the commodification of the self; and the overreliance o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ndermines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innovative capacities. Root causes

include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insufficient digital-intelligent literacy among the youth, lagging regulatory frameworks, and inadequate educational guidance, compounded by deeper structural constraints like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and the overreach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hese dynamics trap young individuals in multifaceted conflicts regarding value cognition and behavioral choices.

Keywords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ra, Youth, Digital Practice, Value Conflict,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加速推进数智时代向更深层次迈进，青年作为网络“原住民”和数智时代的中坚力量，其生产、社交、消费、学习等实践深受数智时代新技术的影响。新技术下，数字化劳动提升了生产效率，虚拟化社交打破了时空限制，平台化消费丰富了产品种类，智能化学习拓展了知识边界，为青年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赋能青年的同时，也催生了一系列价值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算法“流量至上”不断裹挟着青年，使青年沦为数据生产和流量变现的附庸；虚拟交往的符号化特征弱化了深价值层情感联结，引发线上热闹和线下孤独的异化困境；平台化消费的异化挤压了理性的生存空间，导致青年在消费中陷入功利化误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便捷性催生了对技术依赖，导致青年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的退化。这些价值冲突很大程度上干扰着青年的价值认知和行为判断。因此，系统剖析数智时代青年数字实践的价值冲突和生成逻辑，规避其潜在价值冲突，发挥其积极正面效应，引导青年在数字实践中健康成长、实现全面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数智时代青年数字实践的价值冲突

(一) 数字化的生产劳动：效率至上和劳动价值的异化冲突

数字劳动异化导致劳动者与劳动产品、与劳动活动、与人的类本质以及与其他劳动者之间相异化，而数字技术正成为数字时代劳动异化和剩余价值剥削的技术基石[1]。其一，青年数字化劳动产品成为支配自身的异己力量，例如，短视频内容创作者无法自主决定内容的使用场景，平台可随意剪辑、二次传播原创内容用于商业变现；零工从业者的劳动成果被抽象为量化数据，成为算法优化的基础，劳动者无权干预产品的流转和定价。其二，平台算法以效率最优、流量最大化为目标，通过数据监控、量化考核对青年进行规训，使其劳动过程丧失自主性和创造性。对数字内容创作者而言，算法通过分析用户的内容偏好，青年为获得推荐流量，不得不放弃自身价值追求，盲目迎合低俗化、娱乐化的市场偏好，陷入按算法推荐填充内容的创作状态。同时，数字化劳动打破了传统工作和生活的物理界限，随时在线和随地办公成为常态，使劳动成为了青年的负担。其三，数智时代，人工智能的替代性会增加劳动者的替代性焦虑，从而产生严重的失业预期[2]，导致青年重视短期利益，加剧功利化劳动价值观的形成。劳动本应是实现自我价值、促进全面发展的载体，但在数字资本短期收益诱导下，青年倾向于参与无意义的数据标注、垃圾内容搬运等重复性劳动，忽视了劳动能力的提升和劳动的社会意义，陷入短期利益至上的功利化误区，导致自我认同的异化。其四，大数据、算法分析等监控分析技术发展，平台资本为获得更多剩余价值对劳动者的监控越来越精确，导致其与数字劳动者的关系愈发紧张。例如，青年网约车司机

的接单响应时间、青年外卖骑手的送单时长，被平台监控不合格的青年劳动者将面临流量降级、减少收入等惩罚。

(二) 虚拟化的社交活动：连接便捷和情感疏离的价值冲突

青年长期沉浸于光怪陆离的虚幻空间中，会在某个时刻无法区分真实和虚拟，导致自我意识的消解，产生情绪的表达和识别困难等，影响其现实交往能力[3]。虚拟社交中，青年用头像、昵称、动态、表情包等形式进行交流，其真实身份、情感状态及价值观被隐藏。社交逐渐沦为浅层次的“点赞之交”和“评论互动”，缺少面对面交流中的即时反馈和身体在场所带来的深度共情，导致人际联结趋于碎片化与工具化。部分青年为了追求虚拟社交中的“朋友数”和“活跃度”，将社交的数量等同于社交的质量，忽略了深层次的情感连接，进而引发了“网上热闹、现实孤独”的现象，情感得不到有效的释放。同时，由于虚拟社交具有匿名性、且缺少现实社会习俗与行为准则约束，青年的道德感与负罪感也会降低，进而导致道德感的消退[3]。例如，一些青年人在虚拟社交平台发布低俗语句，散播谣言，挑战社会公德，触犯国家法规等。这样无下限的社交方式不仅破坏了虚拟社交的环境，而且歪曲了青年的交友观，加重了虚拟社交场所的价值矛盾。

另外，数字时代的圈层式社交也在加深青年的认知偏差，算法虽能帮助青年找到同圈层的群体并获得社会认同[4]，但是其依据青年的兴趣标签以及浏览记录推送内容，会使青年局限于同质化的社交圈子或相同的信息场域里，多元视角和不同的意见被隔离，只能看到符合自己想法的内容、人等，价值观也逐渐固化。这不仅容易引发网络舆论战的发生和社会群体之间相互排斥的现象，还会加剧社会价值观的割裂。

(三) 平台化的消费体验：主体商品化和理性迷失的价值冲突

数字时代，人不再仅仅崇拜外在商品，而是崇拜被数据化、被商品化的自身，最终导致主体性的彻底消解[5]。数字时代的异化已经从对物的崇拜转变为主体的商品化：青年群体在算法的操纵以及消费主义的诱惑下，主动参与到自身异化过程中，成为自我剥削的数字劳工，陷入到工具理性与情感劳动的深层矛盾中。数字化平台通过数据分析与用户跟踪，将青年群体的身体指标、情绪起伏、消费习惯等转化为可计算、可利用的数据资源，形成了精确的用户模型。同时，平台又构建起“消费即是个性”“拥有即是成功”的话语体系，将消费塑造成个体身份地位的象征。这些数据最终变成了自我商品化的展示：青年为谋求关注和身份认同，将其消费行为变成自我推销的方式，通过购买奢侈品、打卡网红产品、搜集虚拟皮肤等方式，塑造了一个符合算法喜好和社会期待的数字形象。这种符号化的消费实质上是将自己异化成交易性的符号商品，使青年群体陷入“为消费而消费”的怪圈中，逐步丧失对消费价值的独立判断能力，并在资本和算法的规训下陷入“自我增殖”的幻觉，最终导致主体性的消解。另外，数字平台无偿占有消费产生的数据和利润，形成对消费者的隐性剥削，进一步加剧了虚拟消费的异化[6]。消费者在网页上的每一次浏览、点击和购买都会生成数据，成为资本增殖的数据源，而青年却未获得相应的利益分配。

(四) 智能化的学习成长：便捷赋能和技术依赖的成长冲突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易使青年过度依赖技术、导致独立思考能力的退化，陷入低阶学习的困境[7]，同时，自媒体的便捷性导致青年学习的碎片化与浅层化，弱化其深度思考能力，进一步加剧青年在智能化学习中的价值冲突。生成式人工智能(如 ChatGPT、文心一言)在辅助学习、语言讨论、个性化学习等方面极大地降低了青年学习的难度。然而，部分青年过度依赖这些技术工具，放弃深度思考与自主探究，依赖 AI 答疑获取标准答案，忽视知识的内化与理解，导致青年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退化，难以形成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影响长期成长和发展。此外，青年通过短视频、碎片化文章等获取知识，使其难以构建系统的知识框架，削弱其深度思考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导致青年在面对复杂问题时

难以形成全面、系统的认知，阻碍其成长为高素质人才。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工具理性导向，易使青年片面追求学习的个体功利性价值、忽视学习满足国家需要的社会公益性价值，出现学风教育价值引领的错位[7]。智能学习平台中快速提分的逻辑，使青年学习聚焦于短期成绩的提升和技能变现，忽视知识内化、品格培养和能力塑造。例如，部分青年为快速获得证书、提升成绩，参与低质量的速成课程，忽视对知识体系的系统构建；在职业技能学习中，部分青年只关注实用性技能，忽视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的提升。这种功利化的学习模式窄化了学习的育人价值，导致青年有技能无素养，难以实现全面发展。

3. 数智时代青年数字实践中价值冲突的成因

(一) 青年数智素养不足的内在诱因

青年群体虽具备数字技术运用能力，却在算法认知、信息甄别、数字伦理等数智素养上存在明显短板，难以识破算法操纵和流量陷阱，辨别虚假信息和低俗内容的误导，同时忽视隐私的保护和权利的边界。在青年素养缺失和平台的诱导下，青年在数字实践中出现诸多失范行为：在数字化劳动中，为了追求流量和收益放弃原创，直接复刻他人成功内容；在虚拟社交中，为了获得他人认可刻意塑造虚拟人设；在平台化消费中，为了满足虚荣心陷入消费主义陷阱；在智能化学习中，为了追求便利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工具。这使青年难以平衡个人诉求和社会规范、短期利益和长远发展，进而陷入价值冲突。此外，在快节奏的数智生活中，部分青年缺乏明确的精神追求和价值锚点，难以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成就感和归属感，容易在虚拟刺激、即时满足中寻求慰藉，而数字平台的低俗内容、功利化导向、虚拟体验，恰好迎合了青年的短期需求，使青年陷入“娱乐至死”“消费至上”的误区，进一步加剧了价值冲突。

(二) 制度规范滞后和教育引导不足的外部推手

数智时代信息已不是简单的符号传递，而是承载着特定的价值取向，当前“把关人”职责的缺位冲击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8]。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算法治理机制尚不健全，部分平台过度追求流量滥用算法，低俗化和功利化的内容快速传播；数字实践规则的不完善，使青年在数字化劳动、虚拟社交、平台化消费、智能化学习中的权利义务边界模糊，引发矛盾冲突；监管技术相对滞后，难以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虚拟消费等新型数字实践实现有效监管，导致不良价值观传播，加剧价值冲突。与此同时，数智时代，数字平台成为了多元思潮传播的重要载体，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借助短视频、社交动态、AI生成内容等形式快速传播，监督管理制度的不完善，使正处于价值观形成关键期的青年，出现价值判断标准模糊、价值取向偏差等问题。同时，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冲击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内容、方式方法、载体渠道等，使其与青年的数字实践脱节[9]。传统思政教育中数字素养教育多以理论灌输为主，内容形式单一，忽视和青年数字实践场景的融合，难以回应青年在数字实践中遇到的实际困惑。青年正确价值观的培育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等的多元主体协同的数字化育人共同体[10]，当前共同体缺失无法形成有效的价值引导合力，导致青年在面对复杂数字环境时缺乏多元的支持和必要的判断能力。

(三) 技术异化和工具理性僭越的双重驱动

数智时代智能技术深度嵌入青年的日常生活，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技术异化的风险，这种技术异化正从工具性压迫蔓延至对人的主体性的解构[11]。平台秉持流量至上的原则，通过用户数据收集、算法画像、算法推荐等技术手段，对青年进行全方位的量化追踪与行为规训。技术的不断异化和平台对工具理性的追求，使得青年长期暴露于量化反馈的环境中，不再追求内在意义，将外部的数字指标内化为对自我的评价标准，沦为技术的附庸，丧失了主体性和能动性。例如，平台过度强调用户停留时长、互动频次等量化指标，青年为了追逐指标而劳动，创作从自我表达异化为数据生产；青年为了平台的互

动数据而社交，交往从情感联结异化为表演性展示，真实的自我隐匿于虚拟人设中，社交关系沦为获取数字认可的工具；青年在追逐符号化商品的过程中，不仅崇拜外在商品，还崇拜被数据化的自己，消费从自我满足变成了自我异化。与此同时，平台资本为追求商业利益，通过算法诱导、情绪煽动等，刺激青年的劳动热情、社交需求、消费欲望、学习惰性，将青年的数字实践异化为资本变现的工具。技术异化和工具理性的双重驱动不仅加剧了青年的价值冲突，更在不知不觉中加固了平台资本的逻辑，将青年自我价值的实现窄化为了数字指标的实现。

4. 总结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其价值观的形成和实践选择直接关系到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数智时代中，数字化劳动、虚拟化社交、平台化消费、智能化学习等四大场景重构了青年数字实践的场域，个体特质和外部环境交织、技术异化和工具理性逻辑的制约，导致青年陷入多重价值冲突，阻碍其全面发展。

基于此，化解青年数字实践中的价值冲突需要构建起多维的治理路径：一是引导青年树立正确价值导向，自觉提升数智素养和算法认知，在数字实践中保持反思和批判意识，理性应对技术和资本裹挟。二是健全数字治理规则与协同育人机制，完善算法治理和数字伦理规范，加强网络监管，构建政府监管、平台治理、社会监督的多主体治理体系。同时，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开设分学段数字伦理课程；强化学校、家庭、社会协同的多元教育引导，将数字素养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三是数智平台需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优化算法的推荐机制；规范平台资本的运作，摒弃流量至上逻辑，通过技术手段缓解信息茧房和圈层壁垒。

总之，数智技术的发展不应加剧人的异化，而应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个体自觉、规则完善、教育引导和平台治理协同发力，助力青年在数智时代坚守价值底线、实现技术赋能和自我的全面发展。

基金项目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研究课题《青少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精准化实施机制研究》(2025B38)。

参考文献

- [1] 李巧巧. 数字劳动中的资本逻辑与异化扬弃[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50(4): 114-125.
- [2] 赵青矣, 柳建坤. 人工智能替代焦虑、数字技能与青年劳动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感知——基于 CSS2023 调研数据[J]. 中国青年研究, 2025(12): 24-34.
- [3] 武亚运. 虚拟现实与青年的社会交往: 马克思人学向度的探讨[J]. 当代青年研究, 2020(4): 51-57.
- [4] 杨宇辰. Z 世代网络互动仪式的生成机制分析[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4(3): 105-113.
- [5] 叶锦华. 从“商品拜物教”到“主体拜物教”: 数字时代消费主体异化批判[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45(1): 20-29.
- [6] 铁锴, 李明. 数字消费时代的资本逻辑及其治理路径[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52(5): 9-16.
- [7] 赵癸萍. 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大学生学风教育的积极变革、潜在风险及其应对[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25, 41(3): 162-168.
- [8] 吕花, 余双好. 数字社会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机遇、挑战及优化路径[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9(6): 175-180.
- [9] 梁明伟. 数智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提升探析[J]. 思想教育研究, 2025(2): 117-122.
- [10] 宫长瑞, 修珺.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生态系统的生成要素、育人功效与优化路径[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24, 40(0): 150-155.
- [11] 肖峰. 智能技术异化视域下的青年主体性危机与化解[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5, 44(5): 1-12